作者裴士锋（Stephen R.Platt）在前言中写道，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国的起源，以及太平天国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是战争的经过与结局，着重于描述太平军如何以民族诉求来鼓动人心。作者广泛运用了当时的报纸，传教士的记录，参与者的口供、日记等作为材料，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的外国史料，它们为我们理解作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太平天国事件提供了帮助，这也正是西方汉学家的优势所在。

我们将以参与方作为划分，依次讨论清官方、太平军、洋人所扮演的角色。

可能是部分受到“新清史”的影响，作者特别关注到了清帝国汉人与满人之间的隔阂，这是“两个民族的帝国”（这一说法实际上并不严谨）。在面对太平天国的威胁时，清帝国也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集体。一是遥坐北京的清廷，一是直面太平军威胁的湘军。湘军，特别是其主帅曾国藩[[1]](#footnote-1)的身上，体现了至少两个层面的矛盾性。一是作者所说的，“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矛盾，后者体现为对残酷战争处之泰然的政治家，前者则体现为恭敬、淡泊的儒家文人。第二层矛盾，则是具体实践上的，既能够从“爱民”出发，尝试为军队设立严酷的纪律，与百姓“共一家”（前期确实能够做到，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尤其是物资的缺乏，湘军的纪律几乎荡然无存），但又在对太平军俘虏，乃至太平军占领区的妇孺毫不留情，大展屠刀。我们当然可以用政治、战争总是导致生灵涂炭，作为指挥者总要做出取舍来为曾国藩开脱。但是，其一，野蛮的屠杀实在是太多了些；其次，大开杀戒无论如何与儒家的信念没有关系，程序上的不义无法带来结果的正义（至少在前者远远过头了的时候）。我们即使可以部分的“理解”曾国藩，但却难以认为他是什么“儒家的圣人”，这不免差得太远。

在就清廷于太平天国战争中得表现来说，作为当代读者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尤为奇怪。就本书中所写来看，似乎清廷在绿营大败、湘军成为战场的主力以后，除了封给曾国藩以节制数省的总督官职，一再下令进攻以外，再无什么大的动作。完全没有看到作为帝国的中枢，调集全国的物资支援湘军，反倒是湘军屡屡陷于食物不足之境地。作者没有对清廷在军事后勤上的无能做出解释，究竟是因为清帝国没有能力，还是不愿全力支持汉人的湘军。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对于百姓对清廷的态度，本书给出了比《天朝的崩溃》还要来得直接的描写。作者写道：

他们（按：指中国的农民）不是那些因攻击传教士而出名的咆哮中国人，他们也不像是国家遭入侵的愤怒国民。在他们身上，船上的人（按：船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英法舰队，此时正沿着白河前往天津）看不到一丝在意皇帝死活的迹象。随着舰队平安无事往上游驶去，民众的害怕消失，转为有所提防的好奇，乃至有时令人觉得突兀的合作。

被管理者与管理者显然并不分享相同的利益，但这一鸿沟是否因为满清的统治而变得尤其显著？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与坚实的证据。

可能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本书对太平军的描写，基本上集中于两个人物，一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干王”，二是太平军中后期最出色的将领“忠王”李秀成。前者因为其自述，以及传教士的众多记录，而资料尤其详尽。后者的信息则主要来自于被俘后写的万字供词。在没有外部势力插手的情况下，太平天国的覆灭并不令人以外。在洪仁玕于1858年进入“天京”的时候，太平军早已进入了下坡路，特别是洪秀全的不问政事、内部清洗、埋头深宫，从太平天国的中枢瓦解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不过因为本文对洪秀全以及除洪仁玕外的太平天国高层着墨不多，我们无法就此展开深入的探讨。无论洪仁玕如何努力维系，也是无补于事，作为只有将才而无帅才的李秀成则更是如此。由于本书没有详细描绘太平天国的兴起，因此本书几乎就是太平军的覆灭史，偶有波澜，但终归于平静。这些少数的波澜转折，往往与西方人的态度不无关系。

“西方人”的构成远比中国内部还要来得复杂，我们这里挑选三个有代表性的以作说明，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集团或群体内部也是有着不同倾向的，我们只能选择较为占优势的来介绍。

一是英国政府。对于清廷来说，尤为“不幸”的是，在南方的太平天国风头正盛之时，由于咸丰的失策，也由于英法的贪婪，第二次的鸦片战争爆发。这当然又是一次势如破竹、毫无悬念的战争，战争之经过毋庸赘言。不过颇可值得注意的是，从作者所引用的额尔金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别于黑白分明的中国教科书上的单色调的英军统帅形象。我们既看到了战争对人性的吞噬，也能发现人类本性中对于和平的期望，对非正义行径天生的排斥，以及混杂着国家责任与个人良心的挣扎。在历史的风头，个人的所思所想有时并不完全重要，但至少能对历史的细节产生作用。本书为圆明园的毁灭，揭示了一种不同于大陆教科书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于原貌。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反倒是出于一种“不牵连百姓”而将士兵的怒火（这怒火来自于有联军士兵遭到清廷虐待致死）倾洒于朝廷。似乎后续的事实加强了这一看法，圆明园的完全毁灭，与百姓一点一滴将未被烧掉的砖石搬走有关，英法联军只不过开了一个头。在和平条约签订以后，一段时间内，英国政府基本主张在太平军与清廷之间保持中立。但随着对太平天国威胁贸易的担忧，以及太平军外交形象的毁坏，英国政府开始朝着当初的敌人清廷倾斜，阻止太平军进入上海，以及尝试提供一支现代化舰队，至少太平军肯定不会得到来自英国政府或其他政府的任何实际支持。

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的则复杂得多。不同于后来曾流传的“神话”，就传教士群体来说，他们很早就知道了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信仰差异巨大，但他们仍在很长时间内，相当程度上愿意支持或者说对太平天国投以好感，主要是因为洪仁玕。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中唯一的，乃至当时中国极少数的真正了解过西方现代文明的人，也由于曾经担任传教士的经历，使得他与西方传教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这样一层关系，洪仁玕一时间成为了部分西方人眼中的“救世喜讯”、“革命领袖”，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与期待。洪仁玕一开始也确实是期望通过与西方的接触，不仅帮助太平天国在战争中获得上风，也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洪仁玕的努力下，大量的传教士来到天京，来为太平天国服务。但是，洪仁玕是了解西方与真正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唯一人，其他人，尤其是洪秀全本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乃至指控洋人在阴谋颠覆太平天国。于是到了1862年，随着所有的传教士逐渐离开天京，太平军失去了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太平军的国际形象也一落千丈，那些黑暗的真相也为更多人所知。再没有支持太平军的声音，最多只是呼吁理智的中立，这也相当不容易。

西方的媒体站在不同立场而发表对太平天国运动不同的评价，在华的传教士当然是主要的信源之一，当然还有那些驻华的士兵、外交官，以及立场先行只有二手资料的评论员们。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本身也开始发生变化。马克思的例子最为典型，1853年的马克思在报纸上热情赞扬太平天国“革命”可能给世界带来的重大影响，认为这是一场与欧洲境内类似的阶级斗争和经济革命运动，甚至能在其中看到欧洲的未来。虽然当时马克思的具体观点未必为大多数西方人所认可，但其对太平天国的积极评价则是颇有代表性的，在政府机关之外，太平天国确实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声浪。但到了1862年，马克思一改当初的积极态度，转而开始认为太平天国是“除了想改朝换代， 未体认到任何职责”的“恶魔”，“他们对人民的危害更甚于旧统治者带来的危害，他们的使命似乎就只是在阻止（中国）以稳健方式解体，就只是在毁灭它，而且其毁灭方式荒唐骇人，又未植下复兴的种子。”马克思的评价还带有当时所盛行的黑格尔式的偏见，“但只有 在中国，才可能出现这种恶魔，那是停滞型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中国大陆的教材则会对马克思的这些评价予以忽视，大陆如何对待马克思的原文，也是所谓“历史神话”以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一个极好注脚。对太平天国舆论的转向，来得迅速而激烈。于是太平天国和清廷，都随着这场战争而成为了“国际弃民”。

作者在最后总结的教训是，跨越文化与距离的联结有时其实只是虚构的东西，信任不该信任之人会带来巨大的遗憾，无论是洪仁玕对英国人的信任，还是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对清廷的信任。我们还可以从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所提出的观察视角，以历史的不同叙述，来看待太平天国，尤其是结合大陆教科书中的种种“神话”。当然，除了本书所设及的内容外，太平天国的兴起以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的偶然性与结构性在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补，本书作者在曾国藩的史实上似有错误。茅海建《苦命天子》载，曾国藩是在就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并可在差事完成后回乡省亲）的路上，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而本书中，裴士锋则将曾国藩离京回乡的原因归为得知母丧。 [↑](#footnote-ref-1)